

姚喆元 陈正村 主编

世纪脉络

——从“一大”到“十五大”

华夏出版社

D220
7

世纪脉络

SHI JI MAI LUO

— 从“一大”到“十五大”

主编：姚曙光 陈正群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脉络:从“一大”到“十五大”/姚曙光,陈正群主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11

ISBN 7-5080-1415-4

I. 世… II. ①姚… ②陈…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340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0.875 印张 257 千字 2 插页
199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1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世纪脉络与党的建设

高 放

一、从十五个里程碑看本世纪我国前进的脉络

我国有五千年文明的悠久历史,也就是经历了 50 个世纪的演变。其间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农业文明的轨道上缓慢前进,却也创造过古代的辉煌。直到 15 世纪,我国在科技、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依然位居世界之冠。可是自 16 世纪西方开始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以来,我国逐渐显得落后了。尤其是 18 世纪后期西方掀起以蒸汽化为标志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生产力革命,建立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后,我国在 19、20 这两个世纪之中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沧桑巨变。19 世纪中叶,即 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我国由一个强大的独立主权国家逐步沦为依附西方列强的贫弱的半殖民地,我国由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说 19 世纪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备受屈辱的世纪,那么 20 世纪则是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翻身图强的世纪。

回首本世纪之初,1900 年西方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义和团运动失败,1905 年广西会党领导的农民起义也被扑灭;随后清王朝被迫进行的预备立宪措施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立宪运动也无法阻挡革命风暴的到来;1905 年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终于 1911 年爆发辛亥革命,推翻

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但是由于我国封建势力盘根错节，加上帝国主义背后插手，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火花只是昙花一现，瞬又熄灭，国家又陷入北洋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实践证明，不论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无法拯救中国、振兴中华。

只有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本世纪中国的面貌才发生了三次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在1949年推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在1956年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随后，我国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迂回曲折地逐步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具有如此神奇的魔力呢？主要在于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有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组织，有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有亿万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党在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长期斗争中，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起着十分重要的特殊的作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负有制定党章、党纲、路线、方针、政策和选举党的领导人的重大职责，这对于党的兴衰成败具有关键意义。迄今中国共产党已召开过十五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十五次大会犹如十五个里程碑，从中可以看出本世纪我国不断前进的脉络，尽管其中也有过局部的曲折与后退。

姚曙光等同志主编的这本《世纪脉络——从“一大”到“十五大”》就是以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为主线，来考察党的变化和党的领导作用的一本很有特色的专著。从本书我们可以很鲜明地看到这十五个里程碑的具体纪录和不同业绩。

1921年7月在工人运动中心上海召开的党的“一大”，依据马

列主义原理通过要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达到消灭阶级的纲领，决定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在反对军阀官僚和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斗争中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选举产生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时各地党员才有 53 人。

1922 年 7 月在上海举行的党的“二大”，发表宣言，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指明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主要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彻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标志着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大会还通过了第一个党章，选举产生以陈独秀为委员长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时党员增至 195 名。

1923 年 6 月在南方革命中心广州召开党的“三大”。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发展扩大革命队伍，使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求同存异，结成同盟，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大”的决定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国共合作由“二大”的“党外合作”设想变为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使共产党的力量 and 影响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次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初次被选进五人组成的中央局，任秘书。这时党员有 420 人。

1925 年 1 月党又在上海举行“四大”。大会提出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肯定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要争取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参加革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可以说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已经从此萌芽。会上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会后“五卅”运动席卷全国，党在迎接和推进革命高潮中迅速壮大。“四大”召开时党员还只有 994 人，到 1926 年底就增至 1.2

万人,1927年4-5月举行“五大”时又猛增到57900多人。

在革命中心武汉闭幕的党的“五大”,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缺少具体有力的措施,无法挽救当时日益严重的危机。在领导权问题上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陈独秀仍然被选为总书记,这就注定了党必然会遭到严重的挫折。但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血的教训也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告别了幼年的稚气,重新探索中国革命新路。

1928年4-7月中共只好在红都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这时党员总数据说有13万余人,另说是只有2.5万人,实际上可能约有4万人。大会重申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的革命纲领,指出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之后选出的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1931年被捕叛变。大会没有解决的如何坚持并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后来由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从实际到理论都圆满解决了。

从“六大”到“七大”相隔了17年之久。其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等一系列新论断,被党内有识之士王稼祥、刘少奇等称为毛泽东思想。1945年4-6月在延安举行了党的“七大”,这时党员已增长到121万人。大会的最新成果是在新党章总纲部分正式确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大会还确认了毛泽东在组织上的领导地位,会后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从1943年3月起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创造了人间奇迹,出人意料地神速取得了伟大胜利和重

大成就。

1956年9月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了严重后果,在修改后的新党章中不再提出毛泽东思想,只写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大会基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把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第一次写进党章总纲部分,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如果沿着“八大”制定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路线不断前进,那么我国肯定早已继续兴盛,再创辉煌。很可惜,自1957年下半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越来越转向“左”的方面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了歧路,甚至招来了梦魇。

1969年4月举行“九大”时,党员已从1956年“八大”时的1073万又翻了一番,增加到2200万人,可是都深受“左”的思想毒害。“九大”在“左”的思想支配下,不是简单重提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而是更加提高推广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新党章还把“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总纲部分,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九大”还把“左”的理论和路线,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合法化、正规化,用以束缚广大党员,更加深了灾难。

1973年8月召开“十大”时,党员增加到2800万。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理论和路线,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在林彪反党集团暴露之后,随后又形成了江青等人的“四人帮”,继续把国内局势搞乱搞糟。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灾难之后,1977年8月举行党的“十一大”,党员已拥有3500万人。大会在理论上和路线上还未能拨乱反正,但是已把在本世纪内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作为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重新提出,这使我们党在矛盾中徘徊,难以开拓前进。在粉碎万恶的“四人帮”中有巨大功绩的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为副主席。

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大会以此作为指导思想,展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大会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大转折又向前迈出大步。从这次大会起,党中央废除了主席制,更加重视党的集体领导制。这时党员已有3900多万人。

1987年10—11月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汹涌中举行党的“十三大”。大会阐述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一个中心(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并且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初次概括为十二个要点,还指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这时党员已达4600余万人。大会使全党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着重说明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和历史条件、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强调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这对于革故鼎新,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的

伟大旗帜，提出跨世纪的发展蓝图，以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同时还要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把党建设好。我们深信，大会必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

从本世纪中国共产党这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五个里程碑的脉络，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党由建党时仅有 53 个人的小团体，发展到当今拥有 5800 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其间牺牲了无数革命先烈）。在这个党坚强领导和广大党员带动下，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使我国社会发生了世纪性的巨大变化，由任人宰割、依附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变为独立自主的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大国和永不称霸又具有强大自卫能力的军事大国，由贫穷落后愚昧封闭的农业国变为已拥有部分先进科学技术、部分人已开始先富起来的开放型的发展中的工业国。这种沧桑巨变在我国以往 50 个世纪中是绝无仅有的，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深信，只要进一步把党建设好，下个世纪我国将变成为经济大国、科技大国、民主大国、文明大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从十五个里程碑看如何加强党的三大建设

党的“十五大”重申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从党的历史上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经验教训来看，应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呢？

首先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关键是认真学好马列主义，努力提高马列主义思想水平。中央编译局新近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列宁选集》四卷本，至少其中的《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名篇是我们广大党员首先必须熟读的。我们不能把马列主义当作千古不易的教条，要善于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

我们党思想建设的最重大成果是培育了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杰出领袖，以他们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是从党的“一大”开始萌芽，党的“二大”起步，党的“三大”、“四大”充实，党的“五大”、“六大”重申，“六大”后的十多年间毛泽东系统创造，终于完成。到“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它是从党的“十二大”开始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经过“十三大”、“十四大”的系统总结，到“十五大”正式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实践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这两大理论成果对于指导我国的革命与建设有极其重大的实际意义。

我们党的思想建设除了有辉煌成果外，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这就是由于广大党员和党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未能通过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党代表大会纠正、抵制党中央领导人的路线错误。1927年党的“五大”，已经发现并且批判了总书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仍然提不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的纠正右倾错误的方案，以致使右倾错误继续蔓延。1969年党的“九大”、1973年党的“十大”和1977年党的“十一大”也未能抵制、纠正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左”倾路线错误。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切感到：应该以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为表率，刻苦学习他们的论著，尤其是要加强学习更贴近现实的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著作，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方针，运用理论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要警惕右，但主要要防止根深蒂固的“左”，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本职工作能够干得出色。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工程和宏伟事业就能如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众志成城，着手成春。

其次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关键是要大力加强党代表大会的

作用。应该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充分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从创建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就确认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唯一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只是各级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与代表大会并列的最高权力机关;不仅党纲、党章,而且党的基本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都必须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民主讨论、民主决定,中央委员会必须坚决执行;党中央领导人如果发现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已经过时,可以依照党章规定要求提前改变决定,而不得随意擅自改变党代表大会的决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1922年“二大”起党章中都规定中央领导机构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意为执行代表大会决议的机构;自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之后,才去掉“执行”二字,改称中央委员会;但是应该正确地理解,中央委员会理应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不是与代表大会平行的,更不是凌驾于代表大会之上、更高于代表大会的另外一个上级机构。但是,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中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因党代表大会不能按时召开,中央全会或中央特定会议起过党代表大会作用的时有出现。远的如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近的如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起过拨乱反正、端正路线、改组领导的重大积极作用。也有中央全会越俎代庖,擅自改变代表大会的正确决定,推行错误路线的。例如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就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正确估计,强调这对矛盾依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到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更明确规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完全否定了“八大”的正确路线。所以总结历史经验,今后应当强调党代表大会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规范性和权威性,各级委员会不得随意改变党代表大会的决议。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既要重视发挥党代表大会作为唯一最高

权力机关的作用,就要实行党代表大会的年会制。若是每隔五年才召开一次党代会,那么很多重大决策就会被延误了,或者是势必要由中央全会来取代党代会。党代会是否实行年会制并非一个细节问题,而是涉及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原则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参与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中明文规定盟代表大会定于每年8月召开,以便每年通过民主程序及时调整党的方针政策,防止中央专权。如果说党在掌握政权前很难坚持年会制的话,那么成为全国执政党后就完全能够做到。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俄共(布)六年就风雨无阻地举行了六次党代表大会。党代会的年会制是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被斯大林破坏的。从1925年起,苏共召开党代会相隔时间越来越长,由相隔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以至相隔13年之久。这样就把党代会的最高权力集中到中央,进而集中到他个人。斯大林之后苏联党在改革中依然没有恢复党代会年会制,而是每隔四年(1956年“二十大”决定)或五年(1971年“二十四大”决定)才开一次。这样党内民主难以充分发扬,这与后来苏共覆灭不无紧密关系。我们党在建党初期也是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年会制的。从1922年“二大”到1928年“六大”,党章都是明文规定实行年会制。从“一大”到“六大”,大体上也都是坚持年会制(只有“三大”与“四大”相隔一年零七个月,“四大”与“五大”相隔两年又三个月);只有“六大”与“七大”因战争环境才相隔17年之久。1945年“七大”修改党章时考虑到年会制难以贯彻,才改为党代会每隔三年召开一次。1948年解放战争正酣,无法举行党代会,这可以理解。但是1949年建国后还长期拖延不开,就未免令人遗憾了。1956年“八大”鉴于斯大林个人集权的教训和我党的历史经验,不仅恢复了年会制,而且还要实行代表的常任制(即类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样,每届代表大会任期五年,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每届代表任期也是五年)。当时邓小平同志在“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精辟地指

出：“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33页）“八大”的这项根本改革不仅坚持了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可惜由于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越来越“左”，以致这个决定未能付诸实施。仅在1958年开过“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竟然相隔11年之久才举行“九大”。从“九大”起党章一直都规定每隔五年才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深切希望并建议，随着改革开放与党内民主的发展，到下个世纪初即2002年党的“十六大”时，能够恢复“八大”的创造性决定。这是涉及党是否由全体党员当家作主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全面贯彻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大问题。

最后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即端正党风问题。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还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这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很好的总结，并且作为对每个党员的要求写进党章。但是我们党是生长在有两千多年封建主义浓重传统影响的社会环境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党内来。家长制、等级制、特权制、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家族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作风对党时常有所侵袭。以往在地下斗争和战争环境中，由于环境严酷，斗争尖锐，加上从严治党，不断整风，各种歪风邪气难以在党内蔓延。但是当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后，环境变化了，权力更大了，各种不正之风就有所滋生。古人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沿途泥沙俱下，泉水不免变浊。带着升官发财思想、要过高人一等生活愿望而入党的人多了，党风也就难以端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断搞政治运动，计划管理又较严格，所以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都还比较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经济成分多样化，外来影响增大，实行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转变,而政治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改革缓慢、滞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有所放松,以致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败坏,大有越来越严重之势。党在历史上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现在被人们实际上篡改为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颂扬和自我颂扬。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现象十分普遍。社会主义公有制本来是我们的传统优势,可是由于治理不严,缺少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已经由公款吃喝发展到公款贿赂、公款嫖赌的地步。现在一方面是反腐败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果,另一方面则是腐败又在前仆后继地加剧。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报告,1996年全国万元以上经济犯罪案件 15827 件,比上年上升 9.89%,全国检察机关 1996 年结案 162860 件,比上年上升 14.8%,而 1996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9.7%。可见腐败加剧速度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仅数量在增加,而且腐败的层次越来越高(陈希同原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国务委员),情节越来越严重(腐败行为主体由个人向法人、群体转化,不断涌现“串案”、“窝案”、“案中案”),手段越来越恶劣(除隐蔽的权钱交易外,还有公开的“三狼”(工商、税务、审计)、“三虎”(公、检、法)以及“电老虎”、“路霸”、“水霸”等)。按理说,我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清廉度在全世界应该是名列前茅的。可是依据透明度国际组织近期公布的 1997 年各国贪污调查报告,在 52 个国家和地区中,以清廉指数满分为 10 分,我国只得 2.88 分,排名为第 41 位,即是有 40 个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清廉度都比我们高。可见情况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千万不可等闲视之。陈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都反复告诫全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对国内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岂不就是由于贪污腐败不治而被人民推翻的吗?苏联和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岂不就是因为长期搞特权、严重脱

离人民群众而被人民群众抛弃的吗？由于我们党是领导执政的党，如果党风不正，政风和社会风气也难端正。如果党风不正，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各项措施也都会落空或变味。

如何根治腐败、从根本上端正党风，这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不是任何单项措施所能奏效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从总结党代表大会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以为关键是健全党内监督体制和机制。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党的监察机构是从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党章开始设立。分中央和省的监察委员会两级，各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不得以中央委员和省党委委员兼任，监委不属中央或省委领导，但决议须经中央或省委同意方能生效与执行；遇双方意见不同时移交双方联席会议解决，如联席会议再不能解决时则移交代表大会或高级监委解决之。可是这个规定尚未认真实施，1928年7月“六大”的党章就决定不设监委。1945年“七大”的党章规定：必要时得成立中央和各地方党的监委，由各级党委选举产生，并在各级党委指导下进行工作，其任务和职权是处理对党员的纪律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到1949年11月9日中央鉴于我们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才作出决定，要成立党的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决定由朱德任中央纪检委书记。到1954年揭发、批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后，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为了加强党内监督，才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并且选出了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监委。1956年党的“八大”党章仍然规定设立监委，还是推选董必武为书记。建国后我们党设立纪检委和监委主要还是为了加强政治监督，而不是惩治腐败。而当时党内政治上出问题的，大多是由中央不是由纪检委或监委发现的，所以到1969年“九大”时党章中就取消了设立监委的规定。直

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路线，才重新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的纪检委，并且选举陈云为中央纪检委书记。近二十年来各级纪检委在反腐败方面做出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各级纪检委都属各级党委领导，这样各级党委就很难得到有效监督。结果腐败分子就容易抱粗腿、找靠山，得以逍遥法外。为了切实加强反腐败的力度，应该使各级纪检委由各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直接向代表大会负责，不属各级党委领导，而且主要负责监督各级党委领导人，不只是监督下级官员和普通党员。一旦建立了这种具有高度权威的监察机构，并制定出严格的监督法规，再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大力支持，真正雷厉风行地从严治党，铁面无私，那样党风才可能得到根本好转。

但愿广大读者读完本书之后，能够从党代表大会的世纪脉络中认真深入去思考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问题，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把党的建设得更好。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就大有希望，前程似锦。

写于1997年10月13日